

中国现代作家
旧体诗丛

李遇春 ◎ 主编

沈从文

民国诗风

沈从文集

沈从文◎著 王彪◎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民国诗风
中国现代作家
旧体诗丛

李遇春 / 主编

沈从文 / 著
王 彪 / 编著

沈从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集 / 沈从文著;王彪编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378-4854-1

I. ①沈… II. ①沈… ②王… III. ①诗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2316号

书 名 沈从文集
著 者 沈从文
策 划 续小强
主 编 李遇春
编 著 王 彪
责任编辑 贾江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75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54-1
定 价 28.00元

总 序

李遇春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首倡“文学革命”以来，伴随着中国“新诗”的草创及其日渐繁荣，传统的旧体诗词猛然被打入了历史的另册。从此，主流文学界谈到诗歌时就专指新诗，各种现代中国文学史也仅止于叙述新诗的历史进程，而对“旧诗”在历史另一侧畔的艰难行进则视而不见。百年来，虽然也有过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公开为现代“旧诗”张目和辩护，但毕竟属于空谷足音，应者寥寥。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文学史界对“五四”以来盛行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逐步反思和清算，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才开始有限地接纳旧体诗词进入正统的文学史秩序，但也由此在新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连串的关于旧体诗词是否能够入史的争议。其实有争议也属正常，这至少说明了旧体诗词依旧具有生机和活力，它继续在对新诗唯一论或中心论的文学史观构

成挑战。可以预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将会毫无愧色地走进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新诗相颉颃，共同书写现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图谱。

回眸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的历史进程，无数的诗人词客在新文学和新诗处于文坛中心的话语霸权下依旧坚持着旧体诗词创作，他们不认为只有新诗才是现代中国诗歌的唯一合法形式，相反，旧体诗词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代表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实际上，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就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游移和求索，越来越多的新诗人主动到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中寻找艺术资源，他们不满于中国新诗日渐丧失了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和本土特色，他们不愿写那种翻译体的欧化诗，他们想致力于中国新诗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此同时，百年中国旧体诗词同样处于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张力之中，一方面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艺术捍卫或坚守，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胆吸纳西方现代诗歌以及中国新诗的艺术滋养，对传统的旧体诗词创作模式进行更新和改造，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现代中国人抒写现代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诉求，这同样也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由此可见，无论是旧诗界的以中化西，还是新诗界的以西化中，它们都属于现代中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路径，只不过二者在侧重点和立足点上有别，但这种差别并不妨碍二者在深层次上的艺术对话和交流。所以，二者之间不仅不应彼此敌视和排斥，相反应该彼此引为同道，一起为中国现代诗歌寻找民族艺术样式贡献各自的能量。

大体而言，现代中国旧体诗界可分为五大创作群体：晚清遗民诗人群体（陈三立、郑孝胥等）、现代学者诗人群体（陈寅

格、吴宓等)、新文学家诗人群体(鲁迅、郁达夫等)、书画艺人诗人群体(齐白石、赵朴初等)和党政军人诗人群体(于右任、毛泽东等)。而在这五大旧体诗人群中,新文学家诗人群体和现代学者诗人群体在旧体诗词创作上所取得的整体成就无疑更为突出,因此更能够代表现代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水准。一般而言,现代学者所作旧体诗词更偏重于“学人之诗”,而新文学家所作旧体诗词更偏重于“诗人之诗”。前者更热衷于使事用典,展现自己作为学人的学术底蕴,因此在诗词语言上尤喜硬语盘空,讲究夺胎换骨、点石成金,主张字字句句皆有所本。由此带来诗风上的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之类,颇近于宋诗派的路数。而后者更喜欢直抒胸臆,几乎不掩饰自己的诗人性情,故而在诗词语言上偏好清新自然之辞,而反对以生字偏典示人,不做学术资本的炫技者,由此独抒性灵,信手信腕自成法度,这就颇近于唐人作诗的路数了。当然这种区别也不能过于绝对,因为确有新文学家作旧体诗词并不走自然清新的唐人路径,相反却步宋人后尘的,比如“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闻一多即是。闻氏作诗,无论新诗旧诗,都不走寻常路,这与他同时身兼新文学家和古典文学学者的双重身份有关。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创作之间还有一点区别值得注意,这就是现代学者作旧体诗词一般来说更讲究对传统诗词格律的坚守,他们在押韵和平仄上轻易不出格,大都属于现代旧诗创作中的传统派或守旧派,而新文学家作旧体诗词不仅致力于所谓“旧瓶装新酒”,所谓“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且他们还热衷于对“旧瓶”进行改造或改装,对“旧风格”进行颠覆或重构,从而使传统的“旧诗”有了“新诗”的意味。在这方面,胡适、鲁迅、周作人

等新文学家堪作表率，他们都属于现代旧诗创作中的革新派，其诗词创新功绩不能轻易抹杀。

正是出于对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新能力的尊崇，我们策划了这套《民国诗风·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丛》。我们相信这套书的出版，既能为当前日渐升温的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现代范本，又能为日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诗史提供重要的参考文本。中国现代作家热衷于旧体诗词写作并且成绩斐然者不在少数，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此次我们仅编著了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萧军等作家的旧体诗词以飨读者。此外，像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田汉、老舍、胡风等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同样各擅胜场，对它们的编著只能假以时日，让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第二辑的出版。

在这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这就是我们统一采用了编年的体例，每位作家的旧体诗词作品均按照创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读者可以借此领略同一位作家旧体诗词创作的全貌和变迁。我多年来做旧体诗词研究比较偏爱编年体，曾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和《新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最近又获得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类）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的立项，所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以个案编年的形式绘制出的一部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词编年史。至于每首诗词的题解、注释和评点部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尽量搜集与诗词相关的创作史料加以印证和注疏，争取不辜负读者的厚爱。特别说明，每首诗词的题解、注释和评点部

分，我们根据诗词的实际情况提供，以免啰唆、重复。

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续小强先生的信任，几年前我曾在他主编的《名作欣赏》上开过《旧诗新话》专栏，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二次文墨因缘。我希望自己能够不辱使命，但由于这套丛书的注评工作琐碎而繁重，故而丛书中的讹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诸君海涵并不吝赐正。

2015年9月6日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王 彪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字崇文，乳名茂林，后改名为从文。笔名有休芸芸、芸芸、从文、甲辰等。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镇筴的一个军人世家，1988年5月10日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七岁。沈从文的一生有过三次“转业”：由地方军队士兵到新文学家；由新文学家到文物研究专家；由文物研究专家到旧体诗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难以与新时代相适应，沈从文几经挣扎，还是放弃了新文学创作，转业到历史博物馆，进行文物研究工作。十年的默默无闻、十年的勤勤恳恳成就了沈从文历史文物研究专家的地位。然而他并未忘情于文学，1961年的庐山之行，沈从文又开始了旧体诗的创作。1969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中断了文物研究工

作，但这也是他旧体诗写作的一个高峰期。新文学创作成就了沈从文辉煌的前半生，历史文物研究与旧体诗的创作慰藉着沈从文寂寞悲凉的后半生。

一 从新文学到旧体诗

一般读者都是从《边城》《湘行散记》开始接触沈从文的。那时的沈从文是一个淳厚勤奋的“乡下人”，充满灵性与诗意的“凤凰之子”。然而在时势的转换中，他的精神却一度疯狂，近于崩溃。这崩溃不仅是左翼文人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挤压，也源于1940年代以来沈从文思想上由具象到抽象的探索中所陷入的巨大迷茫。当这内外的弦愈绷愈紧时，沈从文难以承受，“自毁”是其最终选择。但沈从文自杀失败了，也沉默了。他主动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在沾满灰尘和沉默的角落里，开始了和文物打交道的后半生。沈从文如一颗沉默的坚果，在钳子下渐渐碎裂了吗？他的文学执念还在吗？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最为擅长的小说和散文领域少有建树，这是不争的事实。“跛者不忘履”，并不是沈从文不想写。他曾七易其稿，写了短篇小说《老同志》；也曾费尽周折，孜孜不倦地收集十多万字的素材，准备写一部以张鼎和烈士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小说；在参加四川土改，去青岛、江西游览时，努力写《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小说）、《青岛游记》（散文）等作品。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沈从文不是不想变通、不想跟上时代，但作为“一匹无法驯服的斑马”，“乡下人”的那种执拗与顽固使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心灵，无法跨越自己文学创作的底线，亦是无法让自己就范于僵化的文学模板与体制

里。他陷入了“不愿舍弃的过去”与“必须接受的现在”的两难挣扎中。于是沈从文终究是沉默了，但也在这沉默里获得了新生：他开始以历史文物研究专家与旧体诗人的新身份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历史文物研究专家的沈从文，众多成就当中的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足以为后人瞩目。而作为旧体诗人的沈从文却一直被历史忽视抑或是不愿正视。这显然是现当代文学史长期以来对旧体文学创作的偏见所致。他们一方面强调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的血缘与脉络，一方面又回避嫡源于古典文学的旧体文学的创作实绩。回到沈从文的旧体诗词，我们不禁要问：沈从文为什么会在1961年转向旧体诗的创作，而且是如此的孜孜不倦？

1961年，沈从文一行九人受邀到江西参观，受同行诗人阮章竞、戈壁舟等人的影响开始了旧体诗创作。沈从文出手不凡，写下了《庐山含鄱口望鄱亭》《井冈山之晨》《资生篇》等旧体诗佳作。这对一个以新文学为业的作家多少是让人感到吃惊的。但当我们了解沈从文其实在新文学之前就开始了旧体诗创作时，或许也就以之为然了。沈从文与旧体诗词结缘是在1917年前后，当时他在湘西地方军队当“司书生”。因文笔不错，颇得萧选青军法长赏识，便跟萧选青学作旧体诗。几年下来也习作了几百首，还颇得老杜风味，只不过现已不存。这是沈从文能在1961年转写旧体诗的根底。另外旧体诗因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毛泽东的垂青在当代形成一种创作风尚，以及国内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也是沈从文转写旧体诗的外部原因。还有两个至关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成因是：首先，沈从文之所以能够出手不凡，得益于其三十年来新文学创作中积累下来的丰富创作经

验。他的很多纪游诗如《漓江半道》《西村景物》等诗中高超的写景技法得益于他小说、散文中“笔致疏朗，着色明丽”的写景笔触；沈从文后期的“文化史诗”和《丹江纪事》《拟咏怀诗》《双溪大雪》等诗很大程度上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的影响，有叙事化的倾向。这显然是受到了他前期小说创作的影响，当然也和他晚年长期从事文物研究有关。

其次，从沈从文写于1961年8月前后的《抽象的抒情》一文可以见出他转向旧体诗写作的艺术根由。《抽象的抒情》是考察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观最值得关注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厘清了进入新中国后自己文学创作上的困惑与困境，另一方面也认清了当下的形势，寻求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写作不久，沈从文便开始了自己时隔四十年之久的旧体诗的创作。文中沈从文表明了对当下文风的认识与自己的困境：“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看’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沈从文不想写，也写不出这样阿谀奉承的文字。他想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与压制，回到个人抒情式的创作。为了争取这一点抒情的权利，他近乎写保证书的语气写道：“事实上如果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分子，这种抒情气

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吃差不多，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这种期望渴求只是沈从文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体制之内是不大可能给予个人创作的这种宽容的，沈从文自己也非常清楚：“问题不在这里，不承认或否认。否认是无意义的，不可能的。否认情绪绝不能产生什么伟大作品。问题在承认后，如何创造作品。”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是在厘清现状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既不违背大时代又能允许个人抒情的创作方式。在新文学创作中，既然自己的写作方式不为时代所容，时代倡导的方式又不被自己所受，这样，在江西之行中，在同行阮章竞、戈壁舟等诗人的影响下，在四十年前就打下的深厚根底之上，沈从文于是回到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诗词创作。

二 异彩纷呈，独辟蹊径

从1961年重写旧体诗开始，沈从文共有近八十首诗作存世。这些诗作里最多的是五古，也有五绝、七绝、七古、乐府等诗体。按照时期和风格特色来看，沈从文的旧体诗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纪游诗时期（1961—1963）、革命颂诗与文化史诗时期（1968—1971）、咏怀、讽刺诗时期（1972—1975）。

纪游诗时期（1961—1963）。沈从文这一时期的诗作主要收入《全集》中《匡庐诗草》（三首）、《井冈山诗草》（十五首）、《赣游诗草》（四首）、《青岛诗存》（一首）和《郁林诗草》（十一首）等几个集子里。1961年到1963年是文艺政策调整的时期，“文艺十条”的提出使得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相对宽松，“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作家创作所需要的条件，刺激作家的劳

动热情。”^①这也是沈从文能够“江西之行”和旧体诗作能够发表的大环境。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主要身份是文物研究专家，写诗只是他的副业，这也使得他与当时文坛拉开了距离。沈从文此时主要的诗作是纪游诗，如《庐山含鄱口望鄱亭》《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资生篇》《游赣州八境台》《游赣州通天岩》《郁林诗草》等篇。沈从文的这些纪游诗“既有大小谢的清朗明净，又有陶渊明和王维的古朴醇厚”^②，如一幅幅彩墨风景画。且看《漓江半道》：“绿树蒙茸山鸟歌，溪涧清润秀色多，船上花猪睡容美，岸边水牛齐过河。”沈从文此时如同隐逸之士陶山乐水，徜徉其中，流连忘返。看《漓江半道花马岩》：“穆王西游忘归久，八骏散轡碧潭滨。千峰铁色如奔赴，谷中青鸟自呼名。”写得是何等的神气酣畅，挥洒自如。然而沈从文的这些纪游诗里除了隐逸情怀也有即景怀古以抒发“时遇共寂寞，生涯同苦辛”的孤寂情怀，如《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游赣州八境台》等篇；也有洋溢着革命热情的纪游诗如《参观革命博物馆》《井冈山之晨》等篇。《白玉兰花引》是这一时期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作，全诗受曹植《洛神赋》启发而成，语言瑰丽多彩，诗风迷离疏荡，是一首充满幻异情调的抒情长诗。

革命颂诗与文化史诗时期（1968—1971）。这一时期的诗作主要收入《全集》中的《牛棚谣》（十首）、《云梦杂咏》（二十首）、《文化史诗钞》（九首）集中。“文革”的爆发不仅使

^①林曼叔等：《中国当代文学史稿》，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14，第74页。

^②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92页。

得文学的创作走向单调与荒芜，而且使得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沈从文被当成“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他此时失去了文物研究的权利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一时期沈从文的革命颂诗有：《闻新人大开会》等诗作。这些诗作中有些景物描写如“楚地多大泽，鸿雁不胜罗。莲菱连十里，鱼虾千船拖”也颇显气魄。但这些诗整体上缺少风雅兴寄，有浅陋空疏之弊。然而此时沈从文的思想情感是复杂的，在革命颂诗之中不时流露出“衰年易感节物换”的怀旧伤今的孤寂、苍凉情绪，如《五月》《想昆明》《昆明村中过春节后景象》等篇。这一时期另一组重要的诗作便是文化史诗，主要有：《文字书法发展》《商代劳动文化中“来源”及“影响”试探》《西周及东周》《战国时代》《书少虞剑》《孔丘何人》等篇。这些诗是沈从文无法从事专业的文物研究的一种替代性补偿，是沈从文以诗的形式对文史研究问题的探寻。这些诗作体制宏大、史料丰赡，但多史的严谨与枯燥，少诗的摇曳抒情。然而也有少数的诗作在史与诗之间做到很好的融合，既有史的丰赡与反思精神，又寓情感于史事，如《读秦本纪》《书少虞剑》等篇。

咏怀、讽刺诗时期（1972—1975）。这一时期的诗作主要收入《全集》中的《京门杂咏》（七首）、《喜新晴》（五首）集中。这些诗一部分写于1972年沈从文尚在湖北丹江时，一部分写于1972年2月回京后。此时沈从文已值古稀之年，虽然以老庄的道家哲学以求自解，但抑不住的衰年之伤，以及动荡时代中那种惊警谨慎的心态流露于诗中。另一方面沈从文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阿谀、虚伪、狡黠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深刻的讽刺。这一时期的咏怀诗主要有：《拟咏怀诗》《喜新晴》《双溪大雪》《七二年

冬过北海后门感事》《拟咏怀诗之一》等。在这些诗中沈从文不仅有“轻尘栖弱草，还惊我独生”的忧生之嗟，而且也多对现实的讽刺，深得阮嗣宗《咏怀诗》的神韵。讽刺诗主要有：《孔丘何人之二》《高知赞》《圣人赞》等诗作。沈从文创作这些讽刺诗时，社会上正值“批林批孔”的政治思潮风起，但沈从文这些诗并不是对儒学的批判，而是对沦为“儒术”的儒学反思，是批判那些披着“圣人徒”“大儒”的幌子，以儒学为干谒之术，弄权求利的知识分子。

沈从文的旧体诗深受杜甫、阮籍、曹植、陶渊明、白居易等古代诗人的影响。杜甫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的诗风，阮籍、曹植被压抑的生命下幽隐孤寂的咏怀诗的神韵，陶渊明倦于世事功利的隐逸情怀都对沈从文的旧诗创作有很大影响。沈从文的旧诗整体上呈现出“朴实苍劲、清新蕴藉”^①的风格。

三 几点说明

沈从文的旧体诗基本上收在《沈从文全集》第15卷，散见于《沈从文文集》《人民日报》《安徽文学》等文集、报纸、杂志上。《全集》中是按照时间和诗集相结合的方法编入，本选本是以编年方式录入。由于沈从文旧体诗的修改稿很多，时间杂乱，不便于排序，本选本按诗作的最开始创作的时间统一排序。年月日不确定的诗作一律放在确定时间的后面。

每首诗的注评分为题解、注释、评点三个部分。正文以《全集》为底本，以其他版本和手稿为参考，不同版本之间重要的差

^①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21页。

异处，在注释部分作说明。正文部分对沈从文所写的序、跋一概收录，其他修改稿中重要的序、跋，亦经择选，录入注释中，以资参考。题解部分是对该诗的写作时间、背景和诗题本身作说明。题解中多引用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和日记中有关该诗的讨论，相互参照，以求对诗作本身有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主要是注释诗中难解的词语、典故及其出处。沈从文原本对诗作的注释一概收录在注释里，为区别于拙注，会在注释后标明“作者原注”的字样。评点部分是对该诗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做粗浅的点评，以求能对读者的理解有一定的参考与引导作用。

本书在选编中，主要参考借鉴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在此特别鸣谢！同时也参考、吸取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说明，这里特向他们致谢。限于编注者才疏学浅，注评中的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